

广义民族学

施正一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C 912.5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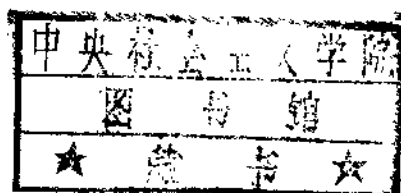
83465



200118719

214/16
广 义 民 族 学

施正一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101号

广 义 民 族 学

施正一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3017733-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张 29.25 字数 755 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50 册

ISBN 7-80091-286-8/Z·141

定 价: 22.00元

本书作者 (按各编顺序排列):

施正一 前言、导论、结束语，
并筹划与通纂全书

- | | | |
|-----|------|-------|
| 金炳镐 | 第一编 | 理论民族学 |
| 张克武 | 第二编 | 人口民族学 |
| 张公瑾 | 第三编 | 语言民族学 |
| 肖秀荣 | 第四编 | 社会民族学 |
| 李竹青 | 第五编 | 经济民族学 |
| 吴宗金 | 第六编 | 法制民族学 |
| 祁庆富 | 第七编 | 文化民族学 |
| 喻捷 | 第八编 | 文艺民族学 |
| 熊坤新 | 第九编 | 伦理民族学 |
| 叶志贞 | 第十编 | 教育民族学 |
| 孙玉兰 | 第十一编 | 心理民族学 |
| 史悠忠 | 第十二编 | 宗教民族学 |
| 白振声 | 第十三编 | 历史民族学 |
| 张崇根 | 第十四编 | 传统民族学 |

前 言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践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这是一个客观真理。我国民族工作的实践和民族科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个客观真理的正确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应当和中国的民族问题的实际与民族工作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建国四十多年来，尽管在民族工作方面发生过不少失误和存在种种问题，但是从总的方面看，由于指导思想理论符合实际情况与实践要求，所以，不仅我们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我国的民族科学也获得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路线指导下，民族工作实践越来越深入，民族学科的发展也越来越多样，民族理论、民族经济、民族人口、民族法制、民族文化、民族伦理、民族教育、民族心理、民族宗教、民族语言、民族历史……等分支学科纷纷建立起来。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理论指导实践开拓。我国的民族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与繁荣的时期。

新的实践要求，需要新的理论来满足；新的思想也力图体现新的现实。微观发展，学科分工愈细，宏观综合就尤为必要。这不仅是现实的要求，而且也是历史的必然。1980年10月全国第一次民族学学术讨论会时，就对怎样发展我国民族科学问题展开了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烈的讨论。总的提法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但具体主张则因人而异，有“社会形态论”者，有“原始文化论”者，有“民族语言论”者，有“民族历史论”者，有“民族经济论”者，也有“民族意识论”者，等等。这些提法和主张，不仅反映了民族学工作者的兴趣越来越广泛，而且也说明了我国民族学也开始走出“厄尔尼诺”怪圈，突破传统的框框对民族共同体要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了。并且还明确强调：“民族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也是广阔的，只要是从民族角度出发来研究它的各个方面、各种过程和各种关系，都是属于它的研究范围的。这当然讲的是广义民族学，或者叫做民族科学。若是从不同方面去研究民族，例如研究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分布、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各个民族的社会组织……等等，那就是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了。若是进行一般的综合研究，概述一般情况，阐明基本原理，那就是普通民族学，或者叫做民族学基础（即狭义民族学）。”^①这里提出了三个不同的民族学概念或范畴：“广义民族学”、“狭义民族学”和“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此后的十年，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不仅国内民族学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而且对国外的民族学研究也有了飞快的进步。各种民族研究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发表了数以万计的民族研究专题文章，出版了数百部著作，还有不少水平很高的大部头专著。真是：“十年胜过半个世纪”。我国民族科学研究进入了空前发展繁荣的新时期，民族学的基础研究加强了，各个分支民族学科建立并且发展了，国内外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展开了，新的研究课题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大量涌现，各个学科的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各方面的专业研究人才大批成长起来。正是：现实不断地提出新问题，推动着人们去思考，民族研究工作者也不断地回答着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实践已经表明，我国民族科学的学科规范化及其理论体系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完善，带有我国的特色即

^① 参见《民族学研究》第1辑第170—171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科学”已经开始建立起来。实践还同时表明，在民族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十年前提出的三种不同民族学概念或范畴的发展趋势，不仅狭义民族学（或传统民族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各种不同分支的民族学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开展，而且对于广义民族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也逐渐开展起来。^①

基于上述民族科学发展的新情况，同时考虑到各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对于高层次的民族专业人才的新需求，进一步开展对民族科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探索一下广义民族学的理论体系问题也许是适宜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组织有关民族学分支学科的专家编写了这本《广义民族学》。这是一本教程性的论著，它主要是为非传统民族学专业的有关民族学科与民族院校研究生提供专业基础课教材，自然也可以作为有关专业教师、研究人员和县以上各部门工作干部的学习研究参考材料。它是一本集体创作，根据事先商定，由于各编均系分支学科可自成体系，作者可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实行文责自负的原则，因此，主编在定稿过程中只对重复部分进行调整与个别文字上的改动。所以，体例统一、观点存异，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也可以说是集体写书的一个固有特点。对于分支学科概念的提法，本书的要求自然是“××民族学”而不是“民族××学”，这在目录中已经体现出来。但是，在各篇作者的具体论述中，由于侧重点不同提法也就不一样，全书中两种提法都有，并列出现。实际上，这是两种具有不同含义的学科概念。对此，我们之所以没有强求一致，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广义民族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发展的现状，而不是对两种不同分支学科概念的模糊理解。这也是应该说明的。

^① 李毅夫同志经过长期的研究，于1988年写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关于我国民族学科体系的反思和设想》的文章，非常详细地阐述了民族研究领域里的“学科体系”即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结构问题，说明了我国民族研究的学科组合的发展是从一元结构到四元结构再到多元结构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学科名称、核心学科和边缘学科、客体层次和主体层次、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具体设想。

西方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怎样存在的，我们是怎样观察的，我们又是怎样比较感觉和概念的，以及又是如何增减、复合和划分它们的，所有这些问题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熟悉的。”“感觉、知觉、想象、推理，事实上我们意识中存在的一切，都须为其存在的权利和理由而答辩。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或我们以为感到了而我们的感官并没有感受到，并且我们的理性也察觉不到的东西呢？”^①在编写《广义民族学》时，我们的感觉似乎也是如此。客观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我们的感官也可能还没有感受到，而我们的理性更没有察觉出来，虽然我们作了很大努力运用我们的认识工具去所研究的问题去进行“答辩”，力求阐述得准确些、完善些，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本书中必然会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希望专家学者、各级领导、各位老师和同学们阅读此书时予以指正，我们将不胜感谢。

^①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杨堃教授序

本书主编施正一教授是我国知名经济学家与民族学家。而他的最大贡献是替我国新创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开拓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即经济民族学。他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第二届执行主席（团体代表）兼组织委员会主任，又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学会理事与《民族辞典》、《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辞典》的主编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的主要组编人。

我在介绍施正一教授主编的这部《广义民族学》时，首先应当说明一下，什么是广义民族学？它和我已经出版的《民族学概论》中所提的民族学，有何关系？有何区别？

关于“民族”一词的概念与涵义，我国学者所讲述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等等，一般全是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民族。那个词在德、法和英文中全是 *nation* 一字，它是仅指阶级社会的民族而言，不包括原始社会民族如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在内。而我在拙著《民族学概论》内所讲的民族，则是来自一个希腊字的 *ethnos* 一字。此字在一般的英文辞典内是不存在的，但在国际的民族学词典内却很通用。无论英、法、德、俄等西方的不同语种，全是一致的。惟此字的意义，却是随着时代与科学的发展进步，而有改变。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还未出现之前，此字的意义是将民族与种族混在一起的。故有人将此字译为民族或人种。而专研究 *ethnos* 的科学，即 *ethnology*，便可译为“民族学”或“人种学”。这在八十年前是存在过的事实，我们自然应当肯定。但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出

现之后，情况就有了改变。而我的《民族学概论》所讲述的民族，便是以 *ethnos* 为对象。我曾称这种“民族”为“广义的民族”。故我的《民族学概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民族学概论。这是我的《民族学概论》与施正一教授主编的《广义民族学》的共同点。

当然也有区别。施正一教授说：“要全面研究‘民族’这个整体，就不仅仅要进行纵向研究即研究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变化和消亡的历史过程，而且也要进行横向研究，即研究民族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或各种主要特征，还要研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关系。正是由于前一种研究，使民族学成为一门历史科学，或者说具有历史学属性的科学；而后一种研究，则使民族学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成为一个科学群体，并由此导致它发展了多个分支学科。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广义民族学。”

我完全同意施正一教授的这种意见。我想借此机会，补充声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必须包括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两个方面。若仅有纵向研究，而无横向研究，那是不全面的。但我在十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授《民族学概论》时，仅靠我一人之力是没有条件这样办的。经过这十年的发展与进步，这一必要条件已经具备。而施正一教授主编的这部《广义民族学》的正式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包括出版界在内，对于广义民族：*ethnos* 这个词缺乏正确的认识。至今还有人将它译为“族体”。同时也有人将 *ethnology* 译为“族体学”或“人种学”，也有人将 *ethnography* 一词译为人种志或人种志学。这全是不恰当的，很容易引起混乱。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发表过《论民族概念和民族分类的几个问题》一文，专门讲过这一问题。可惜我人微言轻，未能引起重视。我希望施正一同志主编的这部大著的出版，能彻底纠正这些错误，这是大有好处的。

施正一教授在译名上采用了“广义民族学的分篇法”。全书除

由施教授自己执笔的“导论”外，共分为十四个部分：（1）理论民族学；（2）人口民族学；（3）语言民族学；（4）社会民族学；（5）经济民族学；（6）法制民族学；（7）文化民族学；（8）文艺民族学；（9）伦理民族学；（10）教育民族学；（11）心理民族学；（12）宗教民族学；（13）历史民族学；（14）传统民族学。施教授还说，俟有条件时，还要增加“政治民族学”、“都市民族学”等等。

据施教授讲，这十四篇分支学科全是分别由不同的专家担任写稿的。我尚未看到这些分论的原稿，暂不评述。但这种分篇法，这种分别由不同专家各就所长，分别撰述的方法，我是完全拥护的。我相信，本书之出版，不仅可以补充我的《民族学概论》之不足，而且还能大大地超过我，纠正我的许多错误，补充我的许多缺陷，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其次，我认为，这部《广义民族学》的另一特点及优点，是在方法论上。它将方法分为三类或三个层次，即：（一）指导方法（或理论思维方法），亦即唯物辩证法；（二）基本方法，如田野调查法、直接观察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叙述法、阶级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等；（三）具体方法，如分析方法、综合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逻辑方法、历史方法、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和从低级到高级的方法等等。

我认为，这样提出的方法论，正是我国当前学术界所必须强调的带有原则性的大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唯物辩证法。试问，如果象前一阶段有些人那样，讲科学方法学而不讲唯物辩证法，这能讲得通么？讲系统科学与哲学而不讲唯物辩证法，那就必然是唯心主义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怎能适合我们的国情呢？

施正一教授主编的这部《广义民族学》，将唯物辩证法作为首要的指导方法，这是非常中肯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当前国

际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下，我们民族学工作者也要在自己的科学园地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觉地投入到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去。这才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我认为这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不应掉以轻心。

关于施教授提出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方法论，我也想提一点补充意见。我认为，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分类法，仅是一种抽象的分类法。它仅在抽象的理论思维上起作用。一谈到应用，一接触到实际，这三种不同层次的方法，便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方法，成为一个整体，缺一也不行。譬如说，田野调查方法中的直接观察法，如果这位调查者不具备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阶级分析法和民族学的基础知识与调查技术的基本训练，那么，便会有许多社会现象，使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不可能从现象而引起敏感，去推寻被隐藏在后面的事物的本质。曾有人在民族地区工作过多年，却对许多民族情况全不了解。这是不奇怪的。

最后，我还想指出，本书主编施正一同志不仅是一位知名学者，而且是一位有组织能力的领导干部。我相信，他能团结广义民族学各分支学科的许多专家，在他周围，各自发挥所长，共同为本书作出贡献，共同将我国马克思主义广义民族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杨 堃

1990年2月25日

宋蜀华教授序

民族学，顾名思义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领域广阔，实用性强，是当今世界很活跃的社会科学之一，备受人们的广泛注意。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故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包括处于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研究其发展规律及其文化创造等等。民族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民族学这门学科及其研究任务的长期性。

近代西方民族学兴起之初，民族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土著民族如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族、太平洋岛屿民族等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着重对其社会制度、亲属婚姻、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行叙述、分析和比较，都不重视历史研究。虽然有些土著民族因其社会发展的局限，除民间创作中包括历史传说外，无文字历史可言，但西方民族学注重对某一民族社会进行平面的叙述、分析和研究，却因而形成传统，甚至成为和历史学之间的分野。这就是所谓的狭义民族学，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往往局限于处于原始民族、部落阶段或保留其残余的所谓“野蛮民族”。

然而人类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也在向前发展，从而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也随之发展。民族学的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它突破了狭义民族学的范围，所谓“文明民族”也成为它的研究对象。民族学更深更广地涉及民族来源、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家庭、婚姻、生活、文化、习俗、信仰等诸方面的问题。从而日益和社会科学中不少学科发生密切联系和交叉关系，诸如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民俗学、地理学、宗教学、人口学以及体

质人类学等等，无不与民族学有关。但民族学和这些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以相互为用，但却不能互相代替，这是由各学科的属性和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所决定。有关各学科从其学科属性和其特定的研究领域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各民族的一个相应的侧面进行研究，从而在该学科中逐渐形成一个分支，以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些分支学科自然和民族学具有密切联系，但却不能代替民族学，它们并不是以民族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只有民族学才把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故民族学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和许多学科具有联系。

以民族学和语言学的关系为例，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或说“民族共同体”已如前述，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但语言从来不是抽象的，它必然存在于某一民族共同体中。在研究中，两门学科可以相互为用。通过语言的研究，对民族特征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民族形成的过程和语言发展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通过语言来研究民族特征及其形成过程，这是以研究民族为目的，故可称为“语言民族学”，这是民族学的边缘学科。另一方面，通过民族来研究语言的特征和发展，即以研究语言为目的，故可称为“民族语言学”，这是语言学的边缘学科。前者不能代替民族学，后者也不能代替语言学。它们是民族学和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却又促进了民族学和语言学的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及其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问题，从而给民族学提出有关的新任务。民族学的研究突破了原来的范围，拓展了研究领域，逐步发展出一系列分支学科，形成一个学科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民族学。再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亦即从纵向方面说，广义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包括各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从横向方面说，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促进了民族学和有关学科的横向联系，导致和民族学有关的分支学科的产生和学科群的出现。这是民族

共同体的发展和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据上述广义民族学和有关学科间的关系，广义民族学的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其他任何别的学科所无法代替的，故而它对民族的整体研究，对于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兴旺，都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广义民族学的研究任务，特别是它的研究重点，不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而且在同一国家内的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也有所不同。例如现阶段我国的广义民族学研究，就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总任务，为实现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大目标，来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

总之，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多民族祖国的繁荣富强，研究广义民族学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宋蜀华

1990年7月10日

李毅夫教授序

《广义民族学》一书，在施正一教授的主持下，经十多位作者近二年的辛勤笔耕，终于大功告成，真是可喜可贺！

此书的编成和出版，实为一大创举，从书名到内容，都是对以往民族学教材的一大突破。我本人有幸在此书酝酿阶段，便已获悉主编的构思和设想，并得以与之促膝畅谈，而深为其才思胆识所动。看来，施君荫生编写此书之念，并非一时兴会所致，而乃多年思忖和执著求索的结果。据我所知，有关“广义民族学”的概念，在其著述中至少可以追溯到1980年。当时，他在提交给全国首届民族学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便已谈及：“民族学也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范围也是广阔的，只要是从民族角度出发来研究它的各个方面、各种过程和各种关系，都是属于它的研究范围。这当然讲的是广义民族学，或者叫做民族科学。若是从不同方面去研究民族，例如研究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分布、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各个民族的社会组织……等等，那就是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了。”（载《民族学研究》第1辑第170页）可见，有关“广义民族学”的内容和框架，当时在他心中已勾勒出一个初步轮廓。

然而，有了这种设想，要把它付诸实现，亦确非易事。施君能锲而不舍，呕心筹谋，相约知己，通力合作，终于将理想变为现实，实属难能可贵；而更为可贵的，是此书提供了一种新的构想和框架，对建国四十年来我国民族研究的学科发展以及近十年来关于学科建设的大讨论做了某种总结和反映，将业已形成的各个分支学科结合为一个统一的学科体系，并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新兴分支学科留有发展余地。

诚然，在我国民族学界，对于究竟建立何种学科体系以及如何命名，都不是没有争议的。自1980年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发表过不同见解。各人的见解各具特色，但英雄所见略同：大家都注意到了我国民族研究领域里学科多元化趋向的发展和多元化结构的形成。而施君诸位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来构建其广义民族学体系的。当然，因系首倡，难免粗疏，尚待进一步完善充实；但这一体系毕竟抓住了学科发展的主要脉络，而使其能适应祖国四化建设和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并能合乎二战后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潮流。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历来存在两种趋向：一是力求深入了解事物的微末细节；二是力求对事物整体进行宏观把握。自二战结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两种趋向表现得更加突出。一方面是科学知识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自然科学已分化出四千多门分支学科，社会科学也分化出四百多门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则是科学知识的高度综合和整体化，不仅许多传统部门科学均已形成拥有众多分支学科的严整的庞大学科体系（如生物学、经济科学等），而且一些新兴科学也都是以学科群体的面目出现的（如环境科学、城市科学等）。而作为研究民族和民族关系的科学，其发展也不能脱离当代世界科学大发展的轨迹。

实际上，民族科学也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术领域，其研究范围要涉及到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若要对一个民族有所了解，就必须对它所在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分布、群体规模和人种构成、历史渊源和社会状况、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心理素质、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等等方面进行考察和研究。而且，所有民族都不是孤立自在的，都要同其他民族发生交往和联系。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好坏，也不是表现在某一个方面，而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等等领域。当前，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各个民族地区所产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